

读 书



文 丛

何处寻求大智慧

吴 敬 琏

读 · 书 · 文 · 丛

何处寻求大智慧

吴敬琏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处寻求大智慧/吴敬琏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3

(读书文丛)

ISBN 7-108-01007-0

I.何… II.吴… III.①社会主义经济—经济理论—研究—中国—文集②吴敬琏—文集 IV.F1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1888 号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宁成春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182,000 字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7,000 册

ISBN 7-108-01007-0/F·59

定价 17.60 元

前 言

自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经济学的“新古典革命”以来，经济学愈来愈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同时，它也变得愈来愈抽象化和形式化了。这使经济学离开它的人文科学根基越来越远，也使经济学文字变得越来越像结构谨严却缺乏文采和激情的自然科学论文。由此，经济学获得了一个“沉闷科学”（Boring Science）的称号。不符合这种要求的经济学文章，常常被认为“不入流”，因而称不上是经济学论文。然而对于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按照上述要求作文却常常并不合乎时代的需要。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变化迅速，而且与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难以用现有的数学工具加以把握。另一方面，改革乃是千百万群众自身的事业，为改革作舆论和技术准备的文字必须面向大众。因此，中国经济学人作为改革的马前

卒，出于推进改革的实际需要，对于大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不能不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字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就形成了一些不符合经济学论文规格的杂文。我自己这些年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其中既有随感时评、讲座报告，也有采访答问、座谈发言，散见于多种传媒。

说实在的，写作经济学论文固然不易，写作面向大众的杂文也有它的难处。这是因为，除非有很深的功力，鲜明生动与严密准确往往难以兼容。我是学习苏式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为了实现知识更新，也曾努力学习过现代经济学。但是总因为根底太浅，要想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融汇贯通地运用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生动地加以表达而不损害它的准确性，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但是因为有实际的需要，也就不能不勉力为之了。

这类经济杂文多是因时感事之作，时过境迁之后，除了作历史研究的素材，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可是由于若干困扰我们的问题如通货膨胀、行政腐败、国企改革的迟滞等长期不能得到解决，这些年来有关的话题总是驻留在报刊的版面上和人们的言谈之中，成为所谓“热点问

题”。不论这应当看作是作者的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它使得这类文字的生命得以延续。也许正是由于存在对它们的需求，《读书》杂志的编辑好久以前就要求我选编一本自己的杂感集。在他们的督促下，现在我选出了近五年的四十篇作品，集结成这本小书，贡献于广大读者。由于《何处寻求大智慧》这篇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事态发展提出一点读书建议的文章出乎意料地引起了强烈的正面响应和反对之声，这本小书就以它的标题作为书名。

吴敬琏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前 言

一、论改革的总体进程

- 3 构筑市场经济基础，踏上现代化之旅
- 23 谨防改革走样
- 29 走好第一步
- 36 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

二、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 55 漫话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66 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注意层次性
- 70 证券市场和上海的产业发展
- 77 刘甲金等主编《绿洲经济论》序言

80	对武汉发展战略的意见
	三、反对通货膨胀
91	切实推进改革，才能保证稳定增长
100	关于一九九三年夏季经济形势的电视讨论
121	对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看法
126	通货膨胀政策决不可行
134	对一九九六年经济形势的分析
	四、关于国有企业改革
145	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和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55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166	李曙光、葛明、李琪著《中国企业破产与重组》序言
171	徐滇庆、文贯中主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序言
175	对诸城小企业改革经验的几点看法
185	小企业改革：放开更要放好
	五、投机与泡沫
195	谈谈“投机”
205	金融市场与泡沫经济

224	何处寻求“大智慧”
237	证券热炒的是与非
	六、肃贪反腐
253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259	“以权谋私”根源何在？
272	反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283	《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再版前言
294	收授“回扣”和市场竞争
298	再谈根治腐败
	七、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评论
313	“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
318	何不试试市场经济的办法？
323	牵“牛鼻子”及其它
327	听吴敬琏“咬文嚼字”
333	贫富差距大小谈
	八、对人和书的评论
351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对诺斯教授讲演的评论
359	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序言

363	东亚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对《东亚经济改革经验》的评论
368	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纪念母亲
377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纪念顾准诞辰八十周年

一、论改革的总体 进程

构筑市场经济基础， 踏上现代化之旅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然后用较长的时间加以完善。

所谓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是指要使市场经济这部配置资源的大机器能够运转所必须具备的基本部件（组织机构），基本运作规则（规章制度），以及保障它的平稳运行所必要的支持系统。尽快建立市场经济基础结构的任务十分紧迫，也完全有条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我认为这种看法把实现转轨和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这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目前的国内外形势都不允许双重体制并存的状态久拖不决。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很好，只要领导坚强有

力和方法得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是能够在三五年内实现的。

国际上一些学者以及国内有人将我国的转轨归为“渐进主义”（gradualism）模式，而将波兰、俄罗斯等国的转轨归为“激进”模式，“大爆炸”（big bang）式的激进过渡似乎使得东欧如堕深渊，而中国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认为这一对比是不完全确切的。所谓“大爆炸”，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始之时苏、东国家领导所选定的战略。恰恰相反，它只是在此前数十年由于不改革或由于“渐进改革”而使有关国家经济病入膏肓时下的一剂“猛药”。这剂“猛药”是否对症固然可以讨论，但是以它来同中国的经济改革战略相类比似乎并不适当。

中国改革进程有别于苏东的一个特点，是改革由农业和其他非国有部门起步。非国有部门成功的改革，恐怕很难用“渐进”二字来概括。例如在农村，直到一九八〇年九月，才正式改变过去的态度，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仅仅过了两年，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的

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 86.7%。一九八三年初，进一步达到全国生产队总数的 93%。到八十年代中期，非国有部门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一半左右，市场要素在我国城乡经济中蓬勃地成长起来。繁荣的市场经济支持了整个改革的进程，使经济波动易于恢复稳定，避免苏东那样的严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开始时期非国有部门还非常弱小时国有部门采取了“缓进政策”的确有益无害。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农村经济体制以及其他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改革进程的差异已显得十分巨大：前者进展顺利，成为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力量进一步成长的强大基地；而后者进展迟缓，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真正的突破，成为妨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改革在初始阶段采取的是由“体制外”开始的策略，在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就必然存在一个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时期。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中后期。一方面，旧的经济体制已经在多方面被突破，原来用行政命令分人、分钱、分物、分指标、分项目的中央计划机关不再能够令行禁止了，而新的经

济体制却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建立起来，特别是没有在作为中国经济骨干力量的国营经济中建立起来，这不能不造成资源配置机能的混乱，导致许多严重的消极后果。由于国民经济中已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机制约束的“体制内”部分之间的摩擦，更由于双重体制下存

在的矛盾，经济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效率。历史经验证明，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时期，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在过渡时期久拖不决，会对整个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造成危害，即使出现了经济繁荣，也难于长期保持。一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严重的逆转，危机与灾难使得人民最终抛弃当政者，“剧变”成为必然的结果。因此，不论改革从何处开始突破，对旧体制的主体部分进行“攻坚”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成为走活改革和发展这盘棋的关键一着。

经济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革速度是不相同的。有的部分，例如价格体系的改革，在有能力保持宏观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另外一些部分，例如产权界定和企业改革，就不可能也不宜于采取所谓“大爆

炸”的方法。在较短的时期，比如说，一两年的时间内实现。因此，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整体性要求来看，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有效运转的那些改革措施，比如价格、财税、金融、外贸等方面的改革，应该采取一揽子的“激进改革”战略，而对于各方面的协调以及金融深化、对外贸易自由化等改革，却必须要有合理的时序安排，否则，也会因为违背客观发展逻辑，导致改革失败或反复。

最近有的亚洲国家，像越南，采取了最低限度的配套改革措施，“把价格搞对头，让市场起作用”，改革迅速取得很大的成就。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设计并实施转轨的操作。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市场取向的转轨只能是一种自然发育过程，由政府设计实施不但超出了社会主义领导层的操作能力，而且违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自下而上”改革的战略的成功，从反面印证了由中央做出改革计划是不成功的，或是不可能的。

我不同意上述改革自发论的观点。所谓改革要有规划、有领导地实施，包含好几层意思。

第一，在某些早期市场经济国家，如英国，市